

少数民族史志丛书

錫伯族簡史簡志合編

(初 稿)

36

5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新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調查組編

錫伯族簡史簡志合編

(初稿)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新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調查組編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1963年·北京

前 言

为了反映建国十年来党在民族工作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反映各少数民族的历史和新的面貌以及新的民族关系，阐述党的民族政策，同时向全国人民进行一次广泛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政策的教育，根据中央指示的精神，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曾在1958年组织所内外大批人员，分赴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一面继续进行社会历史调查（这一工作从1956年即已开始），一面开始编写《少数民族史志丛书》（各少数民族的简史、简志或简史简志合编），到1959年底，大部分书稿都已写出初稿。

这几年来，虽经迭次修改，质量有所提高，但仍然存在着不少缺点甚至错误。现在不加改动的把这些初稿印刷出来，一方面是为了保存资料，免于散失；另一方面更重要的目的，则是为了便于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以便今后能够组织适当力量加以修改、充实和提高，逐个的达到公开出版的要求。因此，我们希望各地的有关党政机关的领导同志、科学工作者，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干部和群众，能够多给我们以批评和指正。

1963年8月

目 录

第一章 概况	[1]
第二章 古代的錫伯族	[6]
一、錫伯族的来源	[6]
二、十六世紀末叶以前的錫伯族	[7]
三、十六世紀末叶至十九世紀中叶的錫伯族	[10]
第三章 近代的錫伯族	[20]
一、鴉片战争以后錫伯族社会状况	[20]
二、英、俄帝国主义的侵略与“苏丹汗国”的反动统治。錫伯族人民的反抗斗争	[22]
三、辛亥革命后的錫伯族	[27]
第四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錫伯族	[30]
一、軍閥、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的黑暗统治，錫伯族的社会经济面貌	[30]
二、党领导下的錫伯族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	[33]
三、三区革命及其对錫伯族的影响	[36]
四、錫伯族人民的解放	[38]
第五章 民主革命的彻底完成和民族区域自治的实现	[41]
一、人民政权的建立和巩固	[41]
二、新疆察布查尔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	[44]
三、民族区域自治的实现	[47]
第六章 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52]
一、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53]
二、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58]
三、人民公社化的实现	[61]

第七章 社会主义經濟建設的伟大成就.....	[67]
一、經濟建設的伟大成就.....	[67]
二、人民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	[78]
第八章 社会主义文化建設的輝煌成就.....	[82]
一、教育大发展.....	[82]
二、語言文字和文学艺术的蓬勃发展.....	[89]
三、出版、广播和电影事业的发展.....	[104]
四、卫生体育齐跃进.....	[106]
第九章 生活习俗	[111]
結束語	[116]
大事年表	[117]

第一章 概 况

錫伯民族是我們伟大統一多民族的祖国大家庭的成員之一，是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它与全国各兄弟民族一起，用自己的劳动和智慧，共同創造了伟大祖国的悠久历史和輝煌燦烂的文化。在这一过程中，由于长期的經濟和文化的联系，使它和汉族等兄弟民族建立了血肉相連的关系。解放后，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錫伯族和兄弟民族一起，更进入了团結友爱、互助合作和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新时代。

十八世紀六十年代以前，錫伯族主要分布在祖国的东北和內蒙古等地，公元1764年（清乾隆二十九年）清政府抽調东北錫伯族八旗兵丁1,016人（連同家屬3,164人），到新疆伊犁駐防，从此就有一部分錫伯族分布于祖国西北的新疆；它們給新疆的牧业地区带来了农业生产技术，并且在守卫和开发祖国边疆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

据1959年統計，錫伯族人口約有26,000余人，主要分布在新疆、辽宁、吉林、黑龙江和內蒙古等地区(1)。新疆共有錫伯族18,000

注 ①云南亦有少数錫伯族，是系1769年从东北抽調去駐防的，只因人口数字未詳，故未列入。

余人,占全国錫伯族总人口的69%强,其中有12,522人(約占新疆錫伯族人口的70%)聚居在伊犁哈薩克自治州的察布查尔錫伯自治县。此外,住在霍城、巩留两县的各在1,000人以上,住在塔城、伊宁和烏魯木齐市的各在500人以上,住在新源、尼勒克、綏定等县的都在500人以下,总的來說,新疆的錫伯族主要是分布在北疆地区。在东北約有7,700余人,分布非常分散。辽宁省有7,290人,散居在辽河流域东北部平原的沈阳、开原、义县、北鎮、新民、凤城等二十多个市县里。吉林省有386人,主要聚居在松花江中游的扶余县和前郭尔罗斯蒙古自治县的錫伯屯等处。

由于长期的相隔和周围环境的不同,新疆和东北的錫伯族在經濟生活和文化的发展上存在有一定的差别。居住在新疆的,由于居住比較集中,保持了自己原有的語言文字和生活习俗方面的許多特点,也受了一些維吾尔族和哈薩克族的影响。居住在东北的,由于居住比較分散,长期与汉族杂居共处,因此,汉族的先进文化对錫伯族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两族人民在生产、生活、語言文字、服飾和风俗习惯等各方面,基本上已没有什么差异。

錫伯語属于阿尔泰語系滿洲通古斯語族滿語支。由于长期与汉族密切联系,因此在錫伯語中吸收了很多汉语詞汇,从而发展和丰富了自己的語言。

錫伯族使用滿文。1947年,伊宁“錫伯、索倫文化协会”將滿文131个音节中发音相同的13个音节废掉,另仿制了3个在錫伯語中有音无字的新音节。

錫伯族主要聚居区——察布查尔錫伯自治县,位于新疆西部伊犁河以南德木里克山(也叫烏孙山是天山支脉)以北的河谷盆地。察布查尔大渠从东到西横貫中部,沿渠两岸是錫伯族人民聚

居区。自治县属于大陆性气候，它的东、南、北都为天山支脉所环绕，西部地形开阔，易受北冰洋气流侵袭，是新疆降雨量较多的地区之一；无霜期约150—160天，适于小麦、水稻、高粱、玉米、棉花、胡麻、瓜果等农作物的生长。这里水草丰美，也是一个很好的畜牧区。德木里克山蕴藏有丰富的煤、铁等矿藏，生长有砍伐不尽的木材，而鹿茸、贝母、大黄、甘草等药材是这里的重要特产。北部河湾里盛产各种鱼类，所以捕鱼也是锡伯族人民一项重要的副业生产。

锡伯族人民很长时期以来，就以经营农业为主。主要农作物有小麦、高粱、水稻、玉米、大麦、糜子、谷子、大豆、油菜、胡麻、芝麻、豌豆、向日葵、马铃薯、甜菜、苕草、棉花和瓜果等。解放后，随着土改、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和人民公社化的实现，农业生产得到空前的发展，锡伯族农村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锡伯族具有悠久的文学艺术传统。并且长期与汉、满、维吾尔等兄弟民族共同相处，吸收了兄弟民族文化的精华，特别是在很早就吸收了汉族的文化。民间故事和诗歌，丰富多采，爱憎分明，感情豪放。雕塑、绘画和刺绣也有很久的历史和极为普遍，图案美观大方，生动逼真，色彩鲜艳。这些都是祖国文化宝库中的宝贵财富。解放以来，在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的鼓舞下，锡伯族的文学艺术获得了新的生命，像百花园一样，万紫千红，光艳夺目，为工农兵服务。

锡伯族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在解放前漫长的岁月里，锡伯族人民为了反抗封建主义的统治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同兄弟民族一起，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在新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时，

为了反抗伊犁地区“苏丹汗国”的分裂祖国的企图、帝俄的侵占伊犁和英帝的侵略南疆，曾进行了三年多的斗争，英勇地保卫了祖国的边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与兄弟民族一起组织了革命起义军，推翻了伊犁地区清朝的封建统治，并向乌鲁木齐进军，进行了艰苦的斗争。1931—1934年，同新疆各族人民一起，对日、英帝国主义的走狗军阀马仲英和大土耳其主义分子沙比提大毛拉的把新疆从祖国怀抱里分割出去的阴谋，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虽然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终于平息了叛乱，粉碎了英、日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保卫了祖国的边疆。1944年，同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各族人民一起，掀起了有名的三区革命，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在三区的反动统治，有力地配合了全国人民解放战争。在东北，锡伯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与东北各族人民一起，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动军阀的卖国活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九·一八”事变后，数以千计的锡伯族青年，参加了抗日联军、义勇军等抗日武装组织，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1949年，锡伯族人民终于同全国各族人民一起，在中国共产党的毛主席的领导下获得了解放，而跨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从此结束了受压迫、被奴役的命运。1952—1953年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东北地区早在1947—1949年就完成了土改任务）；1953和1954年，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实行了区域自治，在新疆成立了霍城伊车戛善锡伯族民族乡，和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1956年在锡伯族农村完成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经过了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和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1958年在党的社会主义总路线的鼓舞下，锡伯族人民与各兄弟民族人民一起，开始了社会主义大跃

进，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现在錫伯族人民同全国各族一起，在党的领导下，高举三面红旗，为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胜利前进。

第二章 古代的錫伯族

一、錫伯族的来源

“錫伯”这个名称，錫伯文作“ ᠰᠢᠪᠦ ” (Sibe)，汉文有室韋、失比、西夔、西北、席百、席北等不同的譯音，关于它的来源和含义，大致有二种不同的解释：

第一、“錫伯”即“鮮卑”的音轉，鮮卑一詞的含义或說是革帶，或說是帶鈎，或說是瑞兽。《西齋偶得》說：“考顾宁人唐韻正鮮古音犀，《汉书》匈奴传黃金犀毗——犀毗帶鈎也，亦曰鮮卑，亦曰师比，总为一物”。錫伯族人民直到四、五十年前还喜欢用一种兽形的帶鈎。

第二、“錫伯”系地名，后来成为住在这里的部落的名称。

比較起来，第一种解释的根据要可靠一些。

关于錫伯族的来源問題，主要也有两种說法：

一說錫伯与滿洲同源，都是女真人后裔，《滿洲源流考》記載太宗詔諭嫩江錫伯說：“我与尔之先世本是同源”，“楊宾《柳边記略》”也說：“席北……自言与滿洲同祖。”

一說錫伯是古代鮮卑的后裔，是东胡的一支，何秋濤《朔方

备乘》說：“鮮卑音轉为錫伯，亦作席北，今黑龙江境內和吉林西北境有錫伯一种，即鮮卑遺民，”李文田《元秘史注》也說：“失比即鮮卑之对音也，亦作席伯，亦作席北；既非索倫，亦非蒙古，即鮮卑遺民也，”在錫伯族人民中間，也一直普遍流行着自己是古代鮮卑后裔的傳說。

鮮卑居地与烏桓接壤，东汉初始与中原接触，东汉和帝永元中（公元一世紀九十年代），大將軍竇宪，遣右校尉耿夔，击破匈奴，北单于遁走，鮮卑南迁占有匈奴故地；桓帝时，鮮卑人檀石槐（可能錫伯語“塔什哈”，老虎的意思）兴起，国势强盛，拓地东西一万四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东部包括扶余、濊、貊二十余邑（部），东晋至南北朝时期，鮮卑北支的柔然，在漠北建立了汗国；南支慕容、拓拔、宇文各部向中原发展，在黃河流域与汉族杂居，吸收了汉族文化，并逐漸与汉族相融合。另有留居在深山密林里的一部分鮮卑人，仍保持着原来的生活方式，他們虽然經常受到其他部落的侵襲，但始終沒有远离呼倫貝尔、綽尔河、嫩江、松花江流域，这一部分鮮卑人在南北朝隋唐之間叫失韋或室韋；在元朝称为失比；明、清間則称西焚、西北、席北、錫伯。

二、十六世紀末叶以前的錫伯族

錫伯族原是呼倫貝尔地区的一个打牲部落。他們的流动性較大，活动区域較广，清朝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修建的辽宁省沈阳市錫伯族家庙“太平寺”石碑上所記：

“錫伯起初居住在海拉尔东南札兰妥勒河流域，后来移居于

墨爾根、齊齊哈爾、伯都訥等地……。

札蘭安勒河疑即今綽爾河。清（後金）太宗天聰年間（1627—1636）。金兵開往黑龍江時，就曾經過“席北綽爾門地方”。綽爾河東南的嫩江左岸，又有名“錫伯蘇蘇”（錫伯語原籍之意）的地方。可見，綽爾河流域早在明代就已是錫伯族的獵場了。

《柳邊記略》說：

“席百一作西北，又作席北，土著于船廠邊外西南（按：南當北字之誤，西南應作西北）五百餘里。……凡自船廠往墨爾根、瑯瑯、墨龍江者由此。”

這裡所說的席北住的船廠邊外西北五百里，就是各書所記載的伯都訥（今吉林扶餘縣）。

錫伯族繁衍之地自海拉爾附近，東南迄于郭爾羅斯旗之北，海拉爾西南伊敏河與輝河合流處西側有室韋山，輿地秘圖和康熙皇輿全圖都把它稱作“Sibe”。由此可見，錫伯族早期的活動區域，北自墨爾根（即嫩江），南抵遼河流域，東自吉林，西到呼倫貝爾，而以綽爾河、嫩江、松花江流域為中心。這一帶的自然條件都很好，尤其是伯都訥，三面帶河，土地肥沃，水草茂盛，出產豐富，是個宜耕宜牧的好地方。

根據史書的記載和民間的傳說，十六世紀末葉，狩獵和撲魚仍在錫伯族經濟生活中長期占著重要的地位，這和他們所處的地理環境有著密切的聯繫，興安嶺、嫩江和松花江等地區，是個很好的漁獵場所。

錫伯族的狩獵沒有任何禁忌，凡獸皆打，凡禽皆撲。如獐子、野豬、兔、狼、鹿、野雞、堪達汗（俗稱四不象）等都在捕

打之列。騎馬射箭是錫伯族的特長，幼穉初生，用紅絲繩扎小弓箭懸于門首，以示他將來要成為騎射能手，十几歲的兒童即能騎馬馳騁于深山曠野之間，他們在艱苦環境里養成了剛強勇敢，吃苦耐勞的性格。錫伯族除狩獵之外，也從事捕魚；當時的一首民謠很形象地描繪了他們的漁獵生活，直到現在還有人記得這首民謠中的兩句：“棒打獐子瓢筍魚，野鷄落在沙鍋里”，還有一首直到現在家喻戶曉的打獵歌也生動的刻劃了他們打獵的情況：

“雪馭如蝶飛，馳騁共撒圍。

踏過千萬山，獵夫凱歌回。”

當時，錫伯族的生產工具，主要是弓箭、木棒、長矛、獨木舟以及麻線織成的魚網。由於生產工具的簡陋和生產方式落后，人們不能單獨跟野獸作鬥爭，所以都是三、五為伙，數十成群的進行集體漁獵，捕獲物基本上是平均分配，人人有分。

隨着社會的發展，生產水平的逐步提高，社會組織也在發生變化，血緣關係逐漸失去它的作用，血緣的結合逐漸過渡到地緣的結合，出現了“嘎善”（村寨），每一個嘎善是由不同的“哈拉”和“木昆”^①組成的。

古代錫伯族由於生產水平的低下和無法理解各種複雜的自然現象，因而產生了对神靈的崇拜和信仰。

錫伯族從前供奉有“喜利媽媽”和“海爾堪。”“喜利媽媽”是保佑家宅平安和人口興旺的神靈，它是用長約二丈的絲繩，上系小弓箭、小靴鞋、箭袋、搖籃、銅錢、布條、背式骨（豬羊膝骨）等物製造的，平時裝入紙袋里，掛在室內西北牆角

注① “哈拉”為同一個祖先的後代，是一個姓氏。“哈拉”內禁止通婚。“哈拉”傳至五代，便分出“木昆”，因此每個“哈拉”包括幾個“木昆”，即氏族。

上，每到春节，由袋内取出，从西北墙角，斜拉到东南墙角上，烧香磕头，到二月初二日再装入纸袋里，挂回原处。制作“喜利媽媽”所用的东西要到本村人口多，輩数全的家戶去找，并邀請人口兴旺，子孙滿堂家庭中年紀最大的人来制作。这主要是記其一家的人數、人数和男女数，并設想一种神灵来保佑子孙平安。添一輩人就在“喜利媽媽”上添一背式骨，每生一子添一弓箭，每生一女添一布条，因此“喜利媽媽”还起着譜书的作用。

“海尔堪”是保护牲畜的神。古代錫伯族的經濟生活中，畜牧占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因此，他們对牲畜的繁殖和安全是非常关心的，从前錫伯族在住房南壁外西上方釘有木板，上放香炉，供奉“海尔堪”，逢年过节对它烧香磕头，主人还要把自己最心爱的好馬献給“海尔堪”，献馬时的仪式是將紅布条或烏羽系在馬尾上，然后将馬拴在“海尔堪”的前面。献馬时如果馬背上不披上妇女的衣服，以后这匹馬妇女就不能騎用。

此外，錫伯族还信仰薩滿教、喇嘛教，也供奉过关帝神、苗神、虫王、龙王、土地神等等。

三、十六世紀末叶至十九世紀中叶的錫伯族

十六世紀末叶，滿洲新兴貴族集团为了扩大自己的疆域，对邻近地区展开了大規模的进攻，給邻近各部落带来了严重的威胁。公元1593年（明万历二十一年）农历九月，叶赫、哈达、輝发、烏拉、珠舍里、納殷、科尔沁、卦尔察、錫伯等九部落联兵三万余进行抵抗，結果失败了。这就是史书上記載的“九国之战”。九国战败后，都先后投降了努尔哈赤。这时，以努尔哈赤

为首的新兴的满洲统治者，为了巩固他在东北的统治，加紧作准备。他们深知，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首先全部征服骁勇善战的东北各打牲部落，以解后顾之忧，为未来的更大规模的征服战争准备必要的人力和物力。因此，他们对东北各部落曾采用了利诱和威逼并用的手段，与已降部落的贵族联姻，并给予高官厚禄，以资笼络，对未降的部落，则进行武力征服。

“九国之战”以前，就有一些锡伯部落的贵族携带亲属和部下投降了满洲，加入了满洲籍，并得到了优厚的待遇。如1588年苏完地方锡伯族部落长索尔果和他的儿子费英东率领五百户投降努尔哈赤就是个例子。努尔哈赤见费英东骁勇善战，便封他为一等大臣，并将其长子褚英台吉的女儿嫁给他，“九国之战”以后，又有一些锡伯部落归服了满洲。如1625年（天命十年）努尔哈赤上谕所说的：锡伯部的巴达那，离开了他们原来的部落，率领三十余人来投降，已封为备御之官。巴达那死后，他弟弟赫洛惠承袭他的官职，跟他同来的人，也世代免除差役。

归服满洲的锡伯族都陆续被编入八旗。

1636—1648年（崇德元年至顺治五年）科尔沁蒙古编旗的时候，科尔沁部内的锡伯、卦尔察两部，也编入旗兵之内，成了蒙古八旗的一部分。

清朝为了捍卫克鲁伦河流域和大兴安岭一带，至1690年把驻防在吉林的旗兵移驻于黑龙江地区，后来，为了补充吉林防兵的缺额，清朝又从别的地方调来了一部分满洲兵和锡伯佐领一人、骁骑校一人、兵六十名。这就是编入满洲八旗驻防在乌拉附近的锡伯族旗兵，也是锡伯族被编入满洲八旗的开始。

1692年（康熙三十一年）锡伯族基本上全被编入满洲八旗兵

之內，移防各地。这次編入八旗的錫伯人分为三部分：

一部分原是蒙古科尔沁部屬下的，于1692年被王公台吉进獻給清朝的錫伯人，与卦尔察等部合計共有14,458丁；其中可以为披甲的11,850名壮丁被分編为上三旗；披甲中的1,000名强壮和1,000名附丁又被調往齐齐哈尔駐防。

一部分是从伯都訥附近图世屯地方的錫伯、卦尔察人中挑选的2,000名壮丁，駐守于伯都訥新建的木城。

一部分是由烏拉附近的錫伯人中挑选3,000人，其中1,000名披甲，2,000名附丁，駐守吉林城。

从此，錫伯族就全部被置于清帝国的統治之下。

清朝的八旗制度是軍政合一的組織。“牛录”（箭）是这个組織的基层单位，每三百人为一牛录，設佐領，五牛录設一参領，五参領設一都統，都統下設左右副都統，佐領直接負責管理牛录內一切軍事与民政，凡挑选披甲（兵），发放兵餉，升、迁、調、补，老兵退伍；分配土地、戶口、訴訟以及征收錢粮等，都归佐領管理。

“八旗兵丁”包括“护軍”、“前鋒”、“亲軍”、“馬甲”“步甲”、“炮甲”……等不同兵种。“披甲”是滿洲兵的总名称。

清帝国把錫伯族全部編入八旗之后，为了防止他們的反抗，又用种种毒辣的办法把他們分割开来，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

清初滿洲統治階級，把东北隶属于他的各部落統名为“滿洲”，滿洲又有新旧之分，自动投降的苏克苏虎等十七个部落叫做“佛滿洲”，即旧滿洲；用武力征服的叶赫、烏拉、錫伯等四十九个部落叫做“伊彻滿洲”，即新滿洲；而归服較晚的綽尔河流域的錫伯人和伯都訥附近的卦尔察人則沒获得“滿洲”的称